

便利、營利與架空的危機：女性主義與 台灣當代小說生產研究

劉乃慈*

摘要

蔚為九〇年代文化主流的衝激性思潮，「女性主義」無疑是促成台灣某種新社會現實之敘事與實現方法之一。弔詭的是，強調知識傳播的網絡化、訊息流通的即時性，往往也使得原本屬於知識文化階層裏的女性論述成為某種流行時尚的消費商品。這種文學現象普遍存在於台灣當代小說中，特別是表現在創作者對於具有較高文學資本效益的象徵符號的攫取，甚至濫用。當「女性」論述透過社會運動與學院建置的過程，漸漸取得它合理的正當性的同時，我們必須要很警覺的是，它與實際接受者甚至生產者之間往往存在著明顯的空隙，甚至是一種貌合神離的關係。作家在實際創作上，為了選取具有優勢潛力、足以自我彰顯的形式、題材和美學成規時，經常必須藉由採用菁英文化觀、「政治正確」的輿論共識來呼應／符合市場上的經濟邏輯。因此簡要地說，當女性符號、修辭與論述在當代社會獲得一穩定的文化象徵資本，使用者基於「便利」與「營利」的誘因，往往促使「女性」背後的種種政治性能量被「架空」。女性主義與台灣當代小說生產的關係，充分體現當代文學生產環境和體制的複雜影響，因此本研究希望重新閱讀幾部當代女性小說的代表性著作，檢視女性主義思潮及其修辭在當代文學場域裡被轉化的過程。

關鍵字：女性主義、類菁英文化、台灣當代小說

* 作者為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台灣當代文學創作、閱讀以及評論研究的多重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新思潮在全球的流通與影響，並且隨著時代的更迭有著更加密切的互動與調整。解嚴前後，整體文化場域裡湧進大量的西方、現代激進思潮，不但刺激許多文學創作家的藝術取向，亦改變當代閱讀人口的文學品味，更是影響評論家對創作者的期許。一個普遍且明顯的例子便是，九〇年代台灣社會裏對於女性意識和性別觀念的關注，它被表徵在文化文學層面上的是女性書寫以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活動的熱絡。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與文化批評在八〇年代中期興起，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在學院體制內形塑的新興力量，與此同時，出版界和文化圈也敏感於這類激進思潮對台灣社會的吸引力，開始積極地大量譯介相關作品。從開課教學、專題研究、學術會議和期刊專號的規劃與執行，乃至於專題報導、副刊專欄、文化座談活動甚至在通俗流行文化雜誌中，圍繞著關乎「女性」的種種議題都成為關注討論的重要對象。而當我們仔細檢視九〇年代台灣的文學寫作生態，更不難發現性別觀念、女性意識同樣也影響了當代作家的選材對象與書寫角度。

「女性書寫」與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深深嵌合在台灣當代政治、經濟主導的文化形構之中。蔚為九〇年代文化主流的衝激性思潮，「女性主義」無疑是促成台灣某種新社會現實之敘事與再現方法之一。弔詭的是，強調知識傳播的網絡化、訊息流通的即時性，往往也使得原本屬於知識文化階層裏的女性論述成為某種流行時尚的消費商品。這樣的文學現象普遍存在於台灣當代小說中，特別是表現在創作者對於具有較高文學資本效益的象徵符號的攫取，甚至濫用。當「女性主義」論述透過社會運動與學院建置的過程，漸漸取得它合理的正當性的同時，我們必須要很警覺的是，它與實際接受者甚至生產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種貌合神離的關係。簡單地說，性別符碼在解嚴後社會已獲得穩定的文化象徵性資本，使用者基於「便利」與「營利」的市場因素經濟邏輯，在消費「女性」的同時勢必使得原有的種種能量被「架空」。

當代小說裏的「女性」表徵，充分體現文學生產環境和體制的複雜影響；而本研究高度關注的，正是女性主義與台灣當代小說生產的關係。首先，我希望掌握全球經濟體系新秩序下強調知識經濟的文化產業現象，來闡釋台灣當代

社會裡正在勃發的「類菁英」(quasi-elite)文化性格。其次，我將重新檢視台灣當代小說最常套用「女性」符碼的幾種範式，分析女性主義的觀念在資本主義消費文化體系裡是如何地被衍易與消耗。九〇年代各種激進思潮使得台灣社會耳目一新，於是在主觀意願上，許多文學研究者面對女性書寫及其批評論述，抱持過於樂觀的態度。這往往使得一個原本具有激進性的論述最後卻落於被架空的危機。從過去已被絕對值化的女性主義思潮，本研究的注意力將轉移到它在台灣文學場域中擴散和轉化的過程。

二、九〇年代的「類菁英」文化

感謝～安哲羅普洛斯 奇士勞斯基 拉斯凡提爾 法斯賓達 貝托魯奇
費里尼 路易·馬盧 伯格曼 彼得·格林 威納 楚浮 布列松 溫
德斯 高達 阿莫多瓦 黑澤明 小津安二郎 伊丹十三 侯孝賢 張藝
謀 大島渚 寺山修司 荒木經惟 三宅一生 山本耀司 村上春樹
賈西亞·馬奎斯 卡夫卡 西蒙波娃 彼得·梅爾 卡爾維諾 羅蘭·
巴特 米蘭昆德拉 波赫士 三島由紀夫 索甲仁波切 張愛玲 瑪格
麗特·莒哈絲 波特萊爾 村上龍 聖修伯理 維吉尼亞·吳爾芙
因為他們是讓這座島浮起來的最大動力。¹

這段引文，出自《誠品副作用》一書封底的感謝詞。其中提及的名人包括有藝術電影導演、文學家、詩人、攝影家、時尚名牌設計大師、女性主義先驅、存在主義哲學家、當代思潮理論家等等。文末一語，「他們是讓這座島浮起來的最大動力」，敏銳而精準地抓住當代台灣全球化文化生活的特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迅速與活絡，刺激解嚴後的台灣形成所謂的後工業社會、商品化社會與資訊社會。由於文化產品在全球的大量產製與流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輕而易舉地便可取用到流通全球的文化產品，大大改變當代的文化景觀。此中，大型連鎖書店為台灣社會提供一個頗具吸引力的硬體空間，在知性而優雅的閱讀氛圍裡，隨時享受無國界的全球知識洗禮。從文學、藝術、哲學、語

1 李欣頻，〈誠品副作用〉封底文字（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1998）。誠品的廣告文案內容偏愛以濃厚文化性的文字來凸顯書店形象，而這些作品多半出自誠品早期的特約文案李欣頻之手。

言、電影、設計、建築、法律、經濟、天文、科學，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裡，我們不斷地進行所有可能的閱讀。

當代台灣對於西方高級知識的取得無疑是快速並且舒適的，背後的社經條件除了外資的開放，其他例如知識人才的迴流、出版社結合平面媒體與文化人的聯手推銷更是重要的原因。² 雖然國際大眾傳媒在給台灣帶來新思想、新觀念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過在國外求學的知識菁英實際上更是充當著這些新興思潮的推手角色。特別是八〇年代後期開始，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人才大量從國外迴流，他們在台灣的學術圈、公共傳媒以及其他文化性設施機構中形成一個新的知識階層。³ 在大學講堂上、在報章雜誌裡，他們講授或撰寫新的思想和主張，甚至把重要的外文著作譯成中文出版。因此，大量的、新翻譯的、幾乎關於每一個可以想得到的議題專書，擺滿整個書架。這種文化現象在九〇年代仍然持續在發生，並且以一種更有系統的方式來進行。⁴ 這波在學院體制內新興的風氣，幾乎是即時地便感染到文化界與藝文圈。對當時處於知識飢渴症狀態的台灣社會而言，新思潮新觀念無疑具有莫大的新鮮感和吸引力。⁵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形塑出一種我所謂的「類菁英」的文化品味與性格。從學院研究體制逐漸擴散到泛知識文化圈，這種標榜大師名哲的學問智慧卻對其高深理論一知半解，特別喜歡添加個人創意思象做即興發揮的「類菁英」文化趨勢於焉成形。如果我們需要在現實體系中為這種半抽象性的特質找出一個具體的對應物，那麼作為當代台灣文化新地標的「誠品書店」，大概可以說是此種「類菁英」風格的最成熟表徵。從書籍營銷方

2 解嚴後台灣政治生態的急遽動盪，更是西方人文社科界的大師論述得以大量輸入且快速著床的關鍵。因為層出不窮的天災人禍、黑金勾結、金融風暴、國家認同、外交策略、族群資源、政治誠信、本土意識等等問題，西方人文社會學科裡的批判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環保運動以及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理論，適時地提供台灣社會鬆動舊權力體系的欲求以及尋找對話的管道。本文因為篇幅所限，在此僅能略過。

3 例如《當代》、《中外文學》此類學術性期刊雜誌。《當代》雜誌於1986年5月的創刊號，推出「米修·傅柯」專輯；1986年8月推出「德西達」專輯；1986年9月推出「女性主義」專輯；1987年1月推出「反對黨與民主政治」專輯；1987年11月推出「新馬克思主義」專輯……等。《中外文學》在近十餘年來的定位，也轉為議題思潮的取向。參閱廖炳惠，〈文學研究在千禧：解讀十年來的《中外文學》〉；劉紀蕙，〈《中外文學》之本土轉向〉，二文皆刊登於《中外文學》28卷8期，2000.01，頁13-16；17-21。

4 蕭新煌，〈共處共存和綜合〉，Samuel Huntington and Peter Berger ed., 康敬貽等譯，《全球化的文化動力》（北京：新華書局，2004），頁35。

5 林耀德、羅青推動的後現代風潮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式、空間設計、人文質感的塑造，誠品是知識經濟與文化產業的成功範例。尤其是創意文案（copywrite）的行銷方式，以最少的資本凝塑誠品的文化形象，成功導引文化消費的氛圍。誠品的文案寫作特別擅長大量拼湊以及重組中西文學、歷史、哲學、藝術、電影、傳播、建築、設計……等人文藝術領域裏的理論話語、專業名詞與名人稱號，營造出一種匯融「知識啟蒙」與「文化素養」使命的「誠品風格」。此類模式，我們在上述《誠品副作用》書底的感謝詞可見一斑，而具有推銷作用的「誠品圖書禮券」〈慾望新法則：兌換圖書禮券的十二種方法〉文案，又是一例：

一月一日兌現村上春樹的彈珠玩具，二月十四日兌現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三月八日兌現西蒙·波娃的女性自覺，四月四日兌現小王子的想像力，五月五日兌現聶魯達的靈感，六月六日兌現波特萊爾的憂鬱，七月七日兌現莎士比亞的愛情……延長送禮的有效期限，……隨時均可兌換一生智慧的即期支票。誠品圖書禮券，讓您的心意在字裡行間陪他／她一輩子。⁶

進步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化素養是「提升」個人風格的必需品，並且它們可以是以「抒情而柔軟」的方式被獲得。

隨著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在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消費文化中，訴諸產品資訊和功能價值的廣告模式已經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非資訊型的廣告模式——產品形象模式、個人化模式以及生活風格模式。在邁向後工業社會的年代，這些具有濃厚象徵性意義與認同形式的廣告已經成為主流。換句話說，廣告的訴求是標誌現階段台灣都會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之文化特質與生活風格的展現，產品形象被塑造成具有知性、精緻與優雅的特質，而個體便是透過消費模式形塑出個人重視知識人文價值的形象。誠品具有濃厚的都會知識雅痞氣息，空間設計典雅舒適，引進大量豐富卻高成本、不易銷售的外文哲學藝術書籍，以此樹立精緻品牌的概念；讓買書、看書甚至是逛書店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菁英時尚。由這群潛在的消費者來發展新商品組合與服務內容，並以人文精神貫穿其間，使得文案廣告模式上的主要訴求對象，也是針對這些被塑造成具有都會形象、強調知性與精緻感、追求自我成就的知識階級。另外，除了經營閱讀服

6 李欣頻，〈慾望新法則：兌換圖書禮券的十二種方法〉，《誠品副作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1998），頁168、170。

務，「藝文空間」的設立並且吸納了各式各樣的演講與展演活動。⁷近兩年來再進一步「開發可閱讀的生活創意」，將涵蓋食衣住行視聽育樂等面向的創意商品加以精選組合，把書店的「知識」功能延伸為創造「人文／藝術／創意／生活」的知性生活空間。⁸例如「誠品書店高雄 SOGO 店新開張」文案寫著：

為愛人買菜，給自己買書。……

離開廚房爐火，提著菜籃到書店找新的烹調創意：

在詩的牧場，收割一本能聞到野香的《草莓集》

到文學農莊，採摘一本剛上架的《蕃茄》

在廚房弄張小躺椅，悠閒地度過火候時間：

讀完泰戈爾的《採果集》，用油醋和橄欖醃的蔬菜應該入味了。

意淫完伊莎貝拉·阿言德的《春膳》，感覺到煙熱，燉牛肉湯就可以起鍋。

逛完一圈彼得·梅爾的《茴香酒店》，聞到微焦香味，蘋果派已經烤好。

作家的靈感是有味道的，能幫你用感情料理三餐

用唇嚐一杯葡萄酒，和消化一整頁的愛情。……

你每買一本書，我們就送一顆剛採下來的新鮮檸檬，

讓每本從這裡帶回去的知識，一剖開都有維他命C的味道——⁹

不僅是把買書納入整體日常生活的消費活動裡，更是讓整個書／知識平易化使之融入整個生活之中。誠品文化工業把原本屬於菁英階層裡的思潮簡單化、平易化、生活化。讓深奧的哲思、抽象的理論、複雜的邏輯，簡單化地轉換成是一種情緒性的氛圍、感受。

7 過去十年來，誠品舉辦了一系列的藝文活動。囊括性別議題、非主流劇場、台灣本土藝術討論、現代文學、紀實攝影、台灣本土文化探討等眾多面向。例如：「現代文學與六〇年代」、「九〇年代閱讀現象」、「女性藝術週」、「中西文學史上的早逝詩人系列」、「台灣藝術的反省與開展」、「1992身體與歷史表演藝術祭」、「邊地發聲：台灣社會運動記錄片展」、「島國顯影：台灣的風土與人物影像展」、「1993原住民文化藝術節」、「台灣本土野鳥生態繪畫聯展」、「日本前衛攝影家作品展」、「瑞典現代工藝展」、「男男、女女、新文化：同性戀專題展」等等。

8 誠品信義店就是最典型的示範。

9 李欣頻，〈誠品書店高雄SOGO店新開張〉，《廣告副作用》（台北：晶冠，2004），頁135。

這種簡化實質內容的方式，正面意義是推廣到普羅大眾生活圈中，但是我們也不能輕易忽略資本主義機制如何透過中層文化向上襲奪高層文化的事實。一個更直接的例子便是：誠品廣告文案對於「兩性書籍」的宣傳內容與主題書籍「性別研究」類的架上陳書，兩者呈現的強烈差距。¹⁰ 在〈誠品五週年閱讀現象座談會〉的廣告文宣裡，強調誠品書店為台灣啟動「閱讀革命」，因此諸如「情色書籍」、「心靈書籍」、「兒童書籍」以及「兩性書籍」的標誌與陳列，對台灣閱眾而言無疑是一場視域上的拓展。其中針對「兩性書籍」的文案內容中寫著：「為什麼 1993 年的鄧如雯事件，不是台灣第一次的殺夫事件？為什麼佔台灣 1/2 人口的女性，卻只有個位數的女性市長？如果您對性別認知或兩性關係懷抱興趣，可以來找您要的書。」¹¹ 這似乎是表示誠品本身對於兩性議題的關注，並且成為書店陳書設計的重點之一。可是如果我們實際走訪向來號稱專業經營的誠品信義旗艦店，在「性別研究」的主題書架上，我們卻赫然發現所謂的「性別研究」竟然摻雜不少例如《情色文化史：從雜交、春宮到房中術》、《禽獸 × 臭婊子記實》、《正說歷代十大名妓》、《清代三百年豔史》、《陰性皮膜性快感》、《金凱特蘿聰明性愛》……等混淆視聽的書籍。¹²

上述現象可能不是以一句簡單的「文學商品化」評語來打發，更重要的是，這類大型書店文化型態不斷提醒我們，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是如何影響不同文化階層各自的地位與彼此的互動。現代化工業社會的文化產銷組織帶動了中額文化（middle-brow culture）的擴充，它往上襲奪上層的菁英文化、往下吸納較低層的通俗文化類型，使得文化層級（cultural stratification）起了內部變化，造成不同階層之間的模糊與混雜。¹³ 而這樣的狀況，在現代非西方國家裡愈顯

10 誠品的圖書設置向來強調多元化與專業化，因此對於一般閱眾較不熟悉、且在大部分書店中往往被混亂分類的領域，例如哲學思潮、宗教思想、女性主義、同志議題，誠品原是有意特設專業書區來加以區隔。然而實際走訪觀察的結果，我們卻可以發現「專業書區」在規劃理念與實際執行面上的明顯落差。此中的影響因素固然複雜，不過因為當代訊息社會與文化資本主義的出版機制更嚴重地造成書籍屬性的難以類歸以及專業位階的不易判斷，應是事實。

11 李欣頻，〈誠品書店五週年閱讀現象座談會：台灣一項閱讀革命正在進行〉，《誠品副作用》，頁59。

12 更令人玩味的是，上述列舉之作品在誠品圖書電腦查詢網站上，有的被類歸到「當代思潮」、有的則放到「文化研究」的範疇。

13 在台灣，七〇年代所謂的「五小」（爾雅、洪範、九歌、大地、純文學）所代表的「純文學」出版品與漫畫言情小說租書店所形成的強烈對比，彼此清楚區隔智識性讀物與休閒性刊物的界線。然而自八〇年代起如金石堂與誠品此類大型連鎖書店的陸續出現，匯集嚴

複雜。

Partha Chatterjee曾於*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一書中指出，在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現代社會裡，高層文化（high culture）通常是舶來品，而此類文學體制往往都是呈現一種架空性質。¹⁴前衛而菁英的文學論述多半以西方文學傳統為主要的參考架構，這與非西方國家裡實際的創作生產以及接受者之間，普遍存在著一種明顯的空隙或差距。張誦聖在研究台灣現代派小說的論文裡也指出，就戰後的台灣文化場域來觀察，由歐美世界傳譯進來的衝擊性思潮往往是作為一種前衛符號而來；它們經常是萌發於校園進而擴展到外部社會，提供給每一代的知識階層不同的新視野（alternative visions）。但是，在傳播與擴散的過程中，這些思潮本身的衍生系譜（genealogy）往往被隱藏，而內容卻迅速被絕對值化。¹⁵以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化場域為例，「後現代」、「女性主義」以及「後殖民」論述正是本文所說的具備高度的文化象徵資本；作為一種新的分析架構，它們在台灣當代學術領域裡的發展狀況其實已有不少學者提出檢討。¹⁶例如，張小虹曾就台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現況，指出其困境。張小虹認為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與西方運動啟蒙、由學院外到學院內之模式大有不同，台灣的女性主義一開始便具強烈文化轉介之學術體質，主要是經由八〇年代赴美研習比較文學、英美文學的學者啟動。因為偏向美、英、法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所以在轉介過程中：

……無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知半解（尤其是理論高難度的後結構女性主義

肅菁英與通俗、休閒娛樂、工具書等等於一爐的購書空間，不但打破「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分野，更是消除「文學」與「非文學」的界線。關於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如何影響文學生產組織與文化位階的互動關係，具體事例分析可以參閱林芳玫的著作，《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時報，1994）。

14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86, pp.6.

15 張誦聖，〈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派小說〉，《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頁198。

16 例如廖炳惠〈在台灣談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文中指出：「以歐美後啟蒙、後現代的觀點，或以非洲、印度、中南美洲為準所發出的後殖民論述，自然無法宣稱其普遍確效性，尤其在台灣或亞太地區去檢視這些論述，難免覺得這些理論格格不入，或者覺得這些理論只能描述、解釋、預期或預設某些層面而已……由於理論的失當以及部分學者長期以來的實驗、試用、引介與強作解人，從台灣來談後現代或後殖民經驗已不再那麼簡單；……在此地談後殖民、後現代，事實上已有幾分新殖民的味道，是在推介或進口歐美理論。」詳細請參閱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台北：麥田，1994），頁62、69。

部分)、照單全收、缺乏批判力之現象，甚至出現採用女性主義修辭策略與分析模式，卻拒絕女性主義意識型態批判的政治立場等『去政治化』之閱讀。而另一個『時代錯亂』(anachronism)的現象也十分顯著，如以美國女性主義之發展為例，在以本質論掛帥的七〇年代大量挖掘、積累女作家之研究，而逐步理論化的八〇、九〇年代則以建構論之方式質疑鬆動原有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美學／政治，以開啟性別研究、同志理論等新領域。而在台灣文化轉介的過程中，往往無法掌握女性主義在歷史脈絡上之爭辯與理論觀念上之轉化，而在時空壓縮與錯亂中，可以同時出現傳統的女性形象分析與去本質化的陰性位置或空間之研究，像1988年的《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批評》和1933年的《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以此兩選集在方法論上之雜沓紛陳而又無理論對話或反思空間(甚至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非女性主義的立場皆有)，可見一斑。¹⁷

從婦女團體的社會運動、學院研究體制的建置、文化知識圈乃至大眾傳媒系統的推波助瀾，女性主義思潮在當代學術界與文化圈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網絡，充分體現前衛符號在當代資本主義文化邏輯裡的生產與再生產關係。這個外來的、新興的文學符碼被個別作家吸收再製的情況，以及敘事作品與現實社會之間產生的某種交換性質，值得我們仔細觀察。

三、「女性」與台灣當代小說書寫

從戰後到八〇年代，台灣文壇陸陸續續崛起不少出色的女性創作者，她們的作品善於捕捉當下社會激烈轉型期間各種婦女處境與時代問題之間的牽絲糾連，這一批豐厚的女性創作，為八〇年代興起的台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適時提供一個充分描述、說明與辯證的分析範式。因此所謂的「女性文學」(不同程度地含括作家性別、題材內容以及女性意識)一詞，就在八〇年代初不脛而走。及至九〇年代，隨著島上政治結構的劇烈變動、社會瀰漫的危機意識、來自中國的威勢恐嚇、國際身分的邊緣曖昧，無不刺激台灣內部社會萌生一股極

17 張小虹，〈性別的美學／政治：當代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慾望新地圖》(台北：聯合文學，1996)，頁124-125。

為強烈的自我定位的欲求。一時間，「女性（主義）」成為九〇年代小說書寫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符碼，它不僅承載女性主體的闡釋空間，更是發揮最大的聚合能量，與國家、族群、歷史、情慾、記憶、第三世界邊緣論述等等，產生時而合盟戰鬥時而分庭頡抗的複雜關係。¹⁸總括而言，女性主義以激進之姿作為促進某種台灣社會現實之敘事方法，重要影響之一便是女性主義與性別符碼成為當代文學場域裡一項豐富的文化象徵資本。

以下我將透過幾位當代女作家例如李昂、成英姝、郝譽翔等人的創作，來檢視女性、女性主義與台灣當代小說的生產關係。這些不論是在八〇年代初蟄聲文壇、抑或是在九〇年代嶄露頭角的當代作家，¹⁹大多都是經由兩大報的文學獎機制而出現。他（她）們大多和台北都會生活形態、文藝社圈流行的思潮時尚以及文化產業賴以繁榮的消費大眾，具有互依共存、絲縷相牽的關係。因此，他們在出道之初便對商品式的經濟邏輯與市場法則的操作，有著相當自覺的適應。即使他（她）們的寫作技巧是受到現代美學藝術的薰陶，實際的作品卻不見得是呼應外來文學規範裡的認知精神；反倒是對於各種文化體制背後的宰制力量，例如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審查制度、社會輿論對「政治正確性」的共識、市場上的經濟獲利原則等等，採取直接或迂迴的相應策略。

（一）激進戰鬥與曖昧遊走的雙贏／營策略

由於歷來創作無一不是觸及父權中心男性世界裏的婦女處境和性意識的幽暗面，李昂成為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文壇裡最受爭議的小說家之一。在言論環境與社會風氣尚未鬆綁的八〇年代初，李昂便以《殺夫》（1984）大膽暴露傳統婚姻制度對傳統婦女的殘酷壓迫，文本對於性與性暴力的描寫尺度堪為當代文學的里程碑象徵。九〇年代的《迷園》、《北港香爐人人插》、《自傳の小説》，尖銳挑戰現實體制與歷史禁忌，一而再地見證作家的創作視域及野心。

《迷園》不以處理婦女問題為滿足，小說本力圖從女性的立場重新思考台灣的歷史以及政治社會的動盪。在台灣本土與中國中心這兩股政治勢力鬥爭尚未白

18 晚近的幾位女性主義台灣文學研究者，已在她們的著作中有相當充分的說明。可參考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台北：元尊，1997）；劉亮雅，《慾望更衣室》（台北：元尊，1998）、《情色世紀末》（台北：九歌，2001）；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等等。

19 八〇年代的主力作家與九〇年代的新興作家，已有「代」的區隔。前者指的是1945年以後到1960年以前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例如施叔青、黃凡、李昂、蘇偉貞、平路、朱天文、張大春、朱天心等人。後者指的是在1960年代出生，我們俗稱的「五年級」作家群，例如林耀德、蔡素芬、張啟疆、駱以軍、袁哲生、成英姝、陳雪等人。

熱化之前，李昂奪其先機將女性的隱喻與台灣獨立運動、台灣史書寫等等主題嵌合勾連。《北港香爐人人插》的批判矛頭，由過去的威權政府進而轉向向來強調民主與進步的反對黨。深諳「邊緣戰鬥」之箇中三昧的小說家，興味盎然地為讀者揪揪「邊緣」之所以為「邊緣」的游移與曖昧。《自傳の小説》跨足歷史小說的領域，試圖藉由一位歷史名女人召回喚醒一段被竄改湮滅甚至遺忘的過往；在小說為這副業已枯朽的女體進行一段段「回春」儀式的同時，被囚禁的歷史也於焉浮現。

女性與性、政治、經濟、權力、國族、歷史的複雜糾合，始終是李昂描摹玩味的重心，再加上這些作品的議題性強、複雜度高、虛構想像與現實社會之間的指涉性佳、藝術設計與時興的理論契合，每每吸引研究者的高度注意，成為當代文學研究者和文化評論家的攻防要地。李昂不僅偏愛套用女性主義的論式表達一系列被邊緣化的社會政治主張，文本觸及的議題深度和廣度，適足為女性主義台灣文學批評打開市場，也為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本土論述提供一個絕佳闡釋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位對後結構去中心、解消理體論述再熟稔不過的小說家，她的書寫因為藝術技巧上層層疊疊的虛實掩映、交互勾纏，十分投合時下文學研究所預期的論述風格。

解讀李昂的小說，特別是她對衝擊性思潮的敏銳與擅用，我們不應該忽略作家長期以來書寫位置（position）的變動歷程。特別是在近二、三十年台灣文化場域的每一次變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李昂「應時當令」地快速調整其書寫位置與批判焦距。自出道開始，李昂對新興的激進論述一直保有敏銳的嗅覺和高度的自覺；16歲之齡，她便以具有前衛性實驗色彩的現代派小說展露創作鋒芒（《混聲合唱》，1975）。七〇年代末台灣社會處於劇烈的轉型期，《人間世》（1977）、《愛情試驗》（1982）、《殺夫》（1983）開始批判父權制度對傳統婦女的壓迫、檢討現代社會結構與新兩性關係的問題。八〇年代中期台灣資本主義社會邁入成熟的階段，當時是也是馬克思主義在台灣獲得特赦而解禁之際，《暗夜》（1985）裡對於資本主義商品行為的觀察頗具心得，其中並且大加渲染若干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九〇年代以降，《迷園》（1991）參與本土論述以及台灣史建構工程；²⁰《北港香爐人人插》（1997）掌握八卦

20 相關研究例如：邱貴芬，〈歷史記憶的重組與國家敘述的建構：試探《新興民族》、《迷園》及《暗巷迷夜》的記憶認同政治〉，《仲介台灣·女人》（台北：元尊文化，1997）；彭小妍，〈女作家的情慾書寫與政治論述〉，收錄於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

秘辛和扮裝（從性到意識型態）的社會時尚；《自傳の小説》（2000）不但藉女性出入禁忌的歷史、更有以此喻託歷史的企圖。²¹

李昂確實是一位問題意識相當敏銳的作家，²²但是我們不難發現，李昂在對新興思潮、符號功能興致勃勃的認可的同時，她對自己作品的內容卻不肯全心背書。呂正惠從藝術技巧與閱讀效果的角度指出，「李昂的小説刻意寫得駭人聽聞，不肯從平凡的現實細節中去發展出更加令人信服的故事。或許這是李昂有意這麼做，以換取讀者的興趣。但反過來說，這又掩蓋了李昂對於兩性問題的敏銳觀察，讓一般人不會以更嚴肅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作品。」²³王德威也認為，李昂顯然「相當熟稔當下種種文化及象徵資本的快速交易取求原則，對流行議題的快速掌握以及強烈煽動性的文字描述，透露她『秀者』（showman）的算計。」²⁴照道理來說，李昂的作品若是因為現實題材與道德標準的衝突而致使小説招致否定，那麼在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日愈受到重視的當下，「根據女性寫作的特質、性與權力結構、中心與邊陲，以至於身體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body）等觀點，李昂的作品似乎找了安身立命之所。」²⁵不過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即使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的眼中，李昂的女性書寫立場也時常游移在激進女權與保守父權的天平兩端。²⁶

李昂的小説每每散發出一種自足自滿的氣息：形式的探險傾向玩票性質，內容即便是批判父權體制主流社會，但是它對主導性的父權價值仍然保有相當程度的興味及好感。在這裡不妨先以《迷園》做為我們檢視的對象。²⁷女主角朱影紅步步為營的結果，終於得到「合法妻子的地位」，她買回菡園、重振菡園，也重寫國族史、家族史和自己的故事。歷來對《迷園》的分析與評論頗多，關於朱影紅如何周旋於階級上的世家小姐、愛情上的小女人、經濟上的新

（台北：麥田，2002）。

- 21 這方面的詳細研究可參閱邱彥彬，〈「記憶失控錯置的擬相」：李昂《自傳の小説》中的記憶與救贖〉，《中外文學》30卷8期，2002.01。
- 22 施淑，〈迷園內外——評李昂的小説〉，《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1997），頁335。
- 23 呂正惠，〈八〇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頁88。
- 24 王德威，〈性，醜聞，與美學政治——李昂的情慾小説〉，收錄於李昂，《北港香爐人插》，頁13。
- 25 施淑，〈迷園內外——評李昂的小説〉，《兩岸文學論集》，頁334。
- 26 黃毓秀，〈《迷園》中的性與政治〉，收錄於鄭明嫻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報1993），頁71-105。
- 27 李昂，《迷園》（台北：李昂個人系列，1991）。

女性、情慾上的豪放女等等諸多身份角色的心路歷程，本文不願再踵事增華。在此我想要提醒的是，朱影紅一方面表現極為開放大膽的性關係，另一方面她那具有傳統女性美德的部分猶然堅持情感的貞潔與忠誠，這樣的狀況特別發生在女主角的「女性主體」受挫時。一再周旋於各種壓迫與被壓迫位置裡的朱影紅，雖然一步步地從女性的立場來探索認識自我，但是陷溺在林西庚挑逗兼羞辱雙管齊下的自虐快感中，朱影紅給自己進行催眠與麻醉：

我終於懂得了那棄絕。……我們作為一個女子，對情愛的渴求，為著不同的緣由，被命定始終無法被真正的了解、懂得與珍惜，無從得到真心的回報，必然的只有被辜負。既然知曉命定要被遺棄，我們，那風（塵）女郎、那歌曲、以及我，便只有自己先行棄絕情愛，如此，歷經了含帶悔恨的無奈與愁怨，在自我棄絕的心冷意絕中，便有了那無止無盡墮落與放縱，那頹廢中淒楚至極的怨懟與縱情。（《迷園》，頁44-45）

在台灣歡場常見的妓女陪酒唱歌的場合裡，我們這位刻意保持抽離與清醒的女主角，為著應召女郎所唱的哀情流行歌曲「兀自感動不已」（頁44）。在極度縱情的墮落快感中她「還能冰清澈骨的明白」（頁44），以最為父權思維的「怨女」姿態為自己作解。由於男女主角的交往始終摻雜著掠奪與交易的色彩，因此，即使朱影紅迫切地希望掌握林西庚，成為他合法的妻子，卻遲遲無法如願。一次意外的懷孕，讓朱影紅瞭解那即將出生的孩子可能會使她僅僅是成為林西庚的情婦，因此決定抹去這個意外：

於模糊的、一切俱遲緩鈍悶的思緒中，我居然還想到，我算終於明白，何以女性們會渴想、或確實可行的以小孩維繫彼此間的關聯。那或許是我們所能有的最終依賴。可是甚至在意識遲濁的其時，仍有一個冰清澈骨清醒的我，藏躲在自身的隱蔽某處，清晰而絕然的肯確在說：這絕不會是我要作的。（《迷園》，頁283）

朱影紅以為拿掉肚腹裡這塊來得不是時候也不夠光明正大的血肉，似乎就意味著可以還她一個冰清玉潔的身骨，繼續她與林西庚的情愛競逐。《迷園》一再提醒讀者，朱影紅與林西庚的孽緣是命定的，而他們的交往過程一如他們的先祖，甚至結局也無法避免地應驗先人的詛咒。所以，有朱影紅墮胎在先，而林

西庚性無能在後。故事最終，朱影紅對成就女性自我的管道唯有透過「重建菡園」——這個充滿國家隱喻與歷史象徵的地方，才能為女性主體找到一個超拔越脫的可能。荒蕪的菡園是女性受挫的慾望和台灣被殖民邊緣化的歷史意識的匯合點，朱影紅誓命重振它，並且在最後讓它「屬於台灣，屬於台灣二千萬人」（《迷園》，頁306），無疑是女性為國族、歷史、政治以及經濟的最大貢獻，而她也在此時獲得救贖與解脫。朱影紅的身體當然是李昂大力操演女性與一切權力關係辯證的場地，但是我們很難無視於女主角每一次陷落自主與受制的弔詭中，那種轉而投向極度封建的父權思想的、如泣如訴的自我麻醉的語句。我們更難接受的是，當女主角在男歡女愛的迷宮裡找不到出口，小說告訴我們，唯有獻身家國與歷史，才是女主角最後安身立命的所在。

李昂這種表面上激進戰鬥而實際上是曖昧遊走於利益兩端（女性主義／父權）的寫作策略，以同樣的邏輯再次運用到《自傳の小説》裡。²⁸ 文本描述張樹敏帶著謝雪紅到神戶經營大甲帽的生意，而她也「由枕邊人開始，學習語言與書寫」（《自傳の小説》，頁49）。只是謝雪紅從張樹敏那兒學到的不是一般正經嚴肅的學問傳授，而是春情蕩漾的知識啟蒙。張樹敏曾經醉言醉語地對謝雪紅說要用他的陽具教她寫字，對知識極度渴求的謝雪紅，某次趁張樹敏醉酒微醺之際，「靠向他懷裡」探問：「『你……你上次不是說，要用你……你那根……教我……』」（《自傳の小説》，頁54）。幾經謝雪紅的央求、挑逗，並且主動「幫他除去褲子，握住它向她身上」（《自傳の小説》，頁55），他也只好「以手握住那早已脹大的東西，跨在她身上，一路從胸、高起的乳、平坦的細腰，真正匆匆大筆大劃的寫了起來」（《自傳の小説》，頁55）。趁男人在她身上揮劃的時候，她伸手去摸索原本放在榻榻米一角的紙筆，立即記下筆劃字形。除了用來交換知識，謝雪紅也懂得如何藉由展示販賣自己的身體來換得經濟的權力。在離開張樹敏後，謝雪紅獨自到台中開了一家「嫩葉屋」的洋服店，專門幫人製作婦女衣服和童裝，終於實現她免受男人束縛的願望。她踩著裁縫機的踏板，身體不斷地向那根「上上下下連絡長線的巨大粗針」（《自傳の小説》，頁88），彷彿只有向它不斷叩首，

才容許我車出的洋服有了腰線（我滾圓的臀在顯露出來的細腰下更鼓鼓地翹起），車出了兩道胸線（我聳立的乳房終於挺身而出），車短了袖

28 李昂，《自傳の小説》（台北：皇冠，2000）。

子與長裙（露出胳膊、臂膀、小腿肚、足裸）……

我成功的販賣人們對我這類的信心，我開了一家店，販賣的是我們初初開始能展現的身形。……

我總先試穿過我店裡的每一款洋服，必要我自己歡喜滿意才推出。如此，我便有若賣的是我的自身、我的身體、我的赤身裸體後，賣出的才是我的洋服。

我能不能，賣的是女人自己，並由此成為「經濟的人員」！（《自傳的小說》，頁88-89）

在漫邊春色中，小說告訴我們謝雪紅是如何地利用她的身體來換取識字／知識的權力；透過女體的販售性展示謝雪紅得以更順利地賣出自己的衣服，小說又一次示範了「職業婦女」之「道」。小說不斷強調女性身體的使用權應該回到女性手中，因此女性應該「自己」運用自身的美色與性換取知識、經濟、權力以及替代男人的位置。然後，李昂也告訴我們，在政治與經濟交換市場中的女體，唯有走向釋放女性情慾（非理性、無交易目的、完全縱情享樂的性愛），才能獲得女性的主體性。謝雪紅與古瑞雲在倉皇逃命的途中，曾經藏匿在一間草房裡；她躺在竹床上，強烈渴望古瑞雲的「身體壓下，並插入我重重的花心，揉捏操插到我如倦開疲展的花瓣，紛紛萎落、包捲」：

我在全然無依中只求保住自身，早一點一滴的在褪去我舊有的女人身體，在回歸最初的本能。

我以此做這或是最後的一次交合，便有如重新開始的第一次。……

此時此刻，地老天荒無盡洪流，我迫切需要你溫暖的藏身之處，一個可以依靠的地方，好確保我新有的女人身體，不會於驚懼中回復原形，……於於我這歷經劫難，開始感到在變為陌生的女人身體上，我索求於你——

讓我最後一次成為一個女人！（《自傳的小說》，頁264）

似乎，那個用身體換取知識、經濟、權力甚至推動「革命」的謝雪紅，她所擁有的是一副因為有目的的交易而顯得不潔和老舊的女人身體；唯一可以「淨化」這些原本屬於男性的價值符碼加諸在她的肉身身上的，便是沒有目的只為體內「最初的本能」的「交合」，「最後一次成為一個女人」。於是，我們

看到謝雪紅恣意用自己的身體與性來交換身體與權力，另一方面也浸溺在單純的、無目的性的女性身體的豪爽當中。

為了獲得自主能力，謝雪紅善用女性本錢的行為似乎應該獲得諒解與同情的眼光；而當革命成功，她那自主的、盎然的情慾更應該博得激烈的掌聲。在買與賣之間，在以女體換取權力的過程裡，究竟是試煉還是墮落？李昂讓她的女主角們受盡摧折，而故事最終卻又安排一場過於唯心與老套的救贖儀式。因此這些作品有意無意間都推舉著一套相似的邏輯：如果女人是被男人用來交換諸如政治權力的資本的話，那她的價值就可以在她的「用處」上被肯定。不過一旦是女人自己運用女性身體來從事交易的話，那麼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掌控權就會被女性自己所取代，而交換得來的政治利益也會被女性全盤接收。因此，小說不斷地提醒女性：竊據男人的位置，要賣身體也要自己賣，要用也是自己拿來用。情慾解放豈是可以如此簡單便宜地和性別主體性畫上等號？最可議的是，以女體做為交易資本，再以「原初」的情慾作為女體的淨化與救贖，這樣的邏輯不是又重新嵌合回男性中心的脈絡當中，抑或者是從來就不曾跳脫出父權意識型態？

李昂擅長利用閱讀上的感官刺激與道德爭議，進行市場銷售量的交易。《迷園》裡朱影紅與林西庚大玩愛情狩獵的遊戲，為了完全地擄獲林西庚，朱影紅在整個狩獵的過程中盡力配合他的要求。那一幕幕展現陽具的場景，由於其次數與樣式的繁多，使得這一部分的《迷園》成為陽具崇拜的嘉年華慶典。《自傳の小説》同樣也是過份誇大女人的性可以換取許多價值交易的邏輯，甚至是成為一種鼓勵性的示範。女作家放縱、誇耀自己的性幻想的意圖，究竟是呈現用陽具崇拜來取悅女神的女性中心狂歡？抑或者是操弄、算計是類情色風月書寫可以帶來的市場經濟（話題性、曝光率、銷售量）？我們在《北港香爐人人插》以及因此掀起的「香爐風暴」，可以看到呼之欲出的答案。²⁹顯然，李昂對於女性在涉足政治公共領域時受到的犧牲，其「關注之情」並未獲得女性讀者們的肯定。此間最主要的癥結在於作家泯滅了藝術創作與現實指涉、人身攻擊的最後一條底線。《北港香爐人人插》的女主角林麗姿原是從事

29 香爐事件在報章上引起的報導和討論，例如：平路，〈女人的戰爭？三角的習題〉《中國時報》1997.08.01；林芳玫，〈香爐文化：女性參政的反控力〉，《聯合報》，1997.08.05；張娟芬，〈參政權與情慾權之間〉，《中國時報》，1997.08.06；何春蕤，〈香爐也有參政權〉，《聯合報》，1997.08.07；平路，〈虛假的陽具？真實的刑台〉，《中國時報》，1997.08.18；胡淑雯，〈誰怕香爐吃香火〉，《中國時報》，1997.08.21等。

黨外運動，因為個性「活潑」被那些得了便宜還賣乖的黨內男同志譏笑是「北港香爐」；她不假思索、恣意妄為的言行舉止，又讓自命正派的女性團體視若蛇蠍。這原本可以是一篇佳作，因為它直搗現代豪爽女人走入男性權力鬥爭中心的盲點與困點，可惜的是，小說在藝術掌握上失控並且故事情節缺乏有力的銜接，竟讓整篇作品成了奇技淫巧大觀。這位名女人究竟是如何以她的身體和她的腦袋爬到男人上面，進而謀取權力資源？這樣的問題絕，對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性愛書寫可以含混帶過、簡單了事的。「被四、五十根陽具插過的女人胴體，會是怎樣的？聽說……」全文約有六、七處像上述這般突如其來、與上下文意脫節的大量性愛描寫，更多的是陽具點將錄以及將女陰與台灣島形的映照比會。女作家對於陽具和女陰的想像力、渲染力，其走火入魔臻至暴虐的程度何曾亞遜於男作家？微妙的是，女作家每每在公開場合中夫子自道，強調文學創作乃至於閱讀不應以政治道德論為害，而應以美學藝術作為最高判斷標準。這本小說不知是因為影射時人所引起的道德輿論，還是因為其中興味盎然的情色書寫刺激書市的消費買氣，總之可以確定的是它讓我們的女作家「名利雙收」。

（二）便利與架空的危機

接下來的篇幅，本文想討論幾位在九〇年代崛起漸受矚目的新生代女作家（1960-）。她們與上一輩嬰兒潮世代的作家相似，在九〇年代透過報紙副刊、文學獎甚至是電子傳媒等等出版機制而蟄聲文壇，作品很自然地也汲取了契合九〇年代後現代都會品味的文學美學形式。一種類似後現代美學觀的戲耍、嬉謔、雜燴成為她們寫作的認知原則。在她們的筆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性別、情慾、身份、國族、歷史等議題如何成為隨手取用和快速代換的符碼，以及「虛有其表」的「女性主義」命題。

成英姝的作品向來以佻達狡黠的風格取勝，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說集《公主徹夜未眠》便因為後設書寫的形式設計，博得文壇讚賞。³⁰其中幾個短篇描寫當代女性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掙扎與叛離，還有對於規範與悖德、愛情與性慾之間的辯證，比起前輩女作家如袁瓊瓊、廖輝英等人更多了分自覺與自信。〈我幸福的生活正要開始〉描寫一個在意外事件中喪失記憶、自私冷酷並且無

30 成英姝，《公主徹夜未眠》（台北：聯合文學，1994）。其中收錄〈我幸福的生活正要開始〉，頁15-27；〈那不是我丈夫〉，頁51-63；〈公主徹夜未眠〉，頁137-150。

理取鬧的壞女人琪琪，她鄙視既醜又窮的水泥工丈夫、一對女兒更是她急於拋棄的包袱。琪琪的丈夫希望透過昔日的結婚照、家庭照甚至是她喜愛的電視連續劇來喚醒她的記憶，失憶的她卻將照片悉數燒燬，並且因為看到連續劇而想到離婚。因為憤怒，她把西瓜剝爛，望著滿牆滿地的西瓜渣，「幻想是殺死丈夫和星星文文的血跡」（〈我幸福的生活正要開始〉，頁23）。〈那不是我丈夫〉裡，劉平是個不顧家又成天往外跑的丈夫，與他認識八年、結婚兩年的妻子，對劉平的記憶卻「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好像不曾存在一樣」（〈那不是我丈夫〉，頁55）。即使聽到自己丈夫極有可能已成為一具焦屍，劉平的妻子在搭計程車前往認屍的途中依舊冷靜無情地盤算著：「不應該搭計程車，警察並沒有說屍體是我丈夫，就算真的是，早幾分鐘跟晚幾分鐘到又有何差別呢？已經變成屍體了還能怎樣？」（頁51）〈公主徹夜未眠〉透過女兒星星的眼睛，看到她那奇怪又壞脾氣的母親：她討厭孩子叫她媽媽、穿著迷你裙、把頭髮染成紅色……。星星與妹妹文文認為母親原本是個溫柔慈祥的好媽媽，只是因為「腦筋被雷打中，從此就變成一個壞巫婆」（〈公主徹夜未眠〉，頁142）。星星對於母親怪異的行徑，都認為那是神經失常所致；例如某夜母親喝醉酒，對星星哭訴她原是個落難公主，被善良老實的老農夫收留，感動之餘嫁給了他，雖然他又窮又醜；又或者是某夜母親告訴她，她原本要和一個很帥的王子逃到外國……。

成英妹以一種冷眼旁觀卻又刻意誇張的黑色幽默來描寫兩性社會裡的婚姻家庭關係。劉亮雅認為這種迥異於某類男性中心寫實主義的成規，而在文類和再現（represent）手法上「走向諷刺、超寫實、荒謬劇，通俗劇或鬧劇的扭曲誇大」的作法，其實是展現了一個女性書寫者對（男性）寫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巧妙翻轉。³¹ 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立場來看，如果用狂想、諷刺、通俗鬧劇等手法凸顯女性的荒謬性處境以展示父權體制的壓迫，那麼我們必須審慎檢視文本裡的「光怪陸離」是否真的達到挑戰男性文化傳統的效果？提醒讀者男性中心想像對女性的剝削？抑或者是因為女性論述雖然標榜批判，但是我們常會漫不經心地挪用僵化模糊的分析概念，在批判主流體制、爭取女性權益之時，卻又反而複製二分的思維邏輯而不自知，陷入媚俗的另類姿態而不自覺。後現代主義特別強調的「不確定論」（indeterminacy），流風所及就連社會大眾也普

31 劉亮雅，〈女性主體、荒謬困境與女性書寫：成英妹的《公主徹夜未眠》〉，《情色世紀末》（台北：九歌，2001），頁126。

遍欣賞這種「曖昧」的論調，偏好標舉即興式、無常規的事物。因此，常見的後現代美學大多被界定為是針對大敘事底下的權利架構，以戲擬、戲耍的修辭策略凸顯出其落差、誤謬的面向，在虛應故事中開拓行動主體的創意。收錄在《公主徹夜未眠》裡的這13個短篇故事，因為篇與篇之間的人物角色互相穿梭其中而略具環環相扣的長篇小說架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正是因為文本與文本彼此相互剝視的拆解效果，而使得包含女性主體在內的任何意識最後都必須落空。

近年來在台灣文壇被泛泛地界定為女性主義小說的作品，其內容所具備的吸引力其實與成功的商業行銷機制以及學術研究的推波助瀾，密不可分。例如，許多作品熱中於對婦女性經驗的描寫與討論，再配合性與情慾是當代女性主義論述的重點，因此往往能夠吸引到某種女性主義式的關注、閱讀以及研究。但是我們需要很警覺的是，描寫性和討論性並非就一定是代表著進步，更不應該單向地以此與性別主體劃上等號。Rosalind Coward在"Are Women's Novels Feminist Novels"一文中即敏銳地指出，當代許多小說明確指向婦女解放運動，甚至相當自覺地運用提高女性意識的方式來架構文本。³² Rosalind Coward擔心的是，如果只因一本書將婦女經驗（不論是個人的、社會的或者生理的經驗）放在中心地位就認為它具有女性主義的特質，這將陷入極大的陷阱。³³ 例如色情文學批評便是常常突出女性的性體驗，而它恰恰是最為女性主義者所反對的。³⁴

Rosalind Coward關於女性小說與女性主義小說的概念辯證，雖然早已不是女性主義及其文學批評的新意，然而它仍然不斷地提醒研究者對於小說裡的女性主義命題或修辭的審慎釐析。過去幾年，郝譽翔以處理女性題材和怪誕想像的書寫風格，成為新世代作家的情慾代言人。輯錄在與書同名的短篇小說〈洗〉，描寫一位家庭主婦如何因為撫觸自己的裸體以及陌生人的偷窺，為平庸的婚姻生活增添刺激與快感。³⁵ 小說以女主角為敘述者，將故事分成兩條敘述線：其一是女主角現下的婚姻家庭生活，另一條則是回溯她過去青澀年華所發生的點滴。嫁做人婦多年，女主角在枯燥的婚姻關係裡毫無魚水之歡可

32 Rosalind Coward, "Are Women's Novels Feminist Novels?" in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c1985, pp.225-293.

33 同註30，頁231。

34 同註30，頁233-234。

35 郝譽翔，《洗》（台北：聯合文學，1998），其中收錄短篇小說〈洗〉，頁15-33。

言，卻是得每日烹殺活魚來奉待公婆。生活中唯一的刺激與歡愉，就是傍晚做完飯後躲在浴室裡細細清洗自己的身體。在流動的水聲中，女主角發現了窗外的窺伺者，而她也正在偷窺那個偷窺她的人。小說的另一條敘述線先是回溯她少女時代的性經驗啟蒙；她先是將她的第一次給了高中時代的一位詩人，後來因為缺乏想像力，詩人離她而去。大學聯考放榜，女主角的高中死黨B因為表現失常而淚流滿面，在互相安慰的過程中發展出同性情誼。後來B選擇出國，在一個雨雪的冬夜以劃破動脈的方式自殺。

這篇小說以最不令人期待的結果匆匆為女主角的幻想與奇遇作結：原來那個窗外的偷窺者竟然就是自己的丈夫。文本選擇以女主角的丈夫，一個偷窺的男性，作為「反高潮」的結尾方式，讓文本落入怪誕奇想的格局，卻減弱小說一開始因關注女性在婚姻體制裡的處境而帶動的批判力道。女人與水與魚的象徵，女性情慾與窺伺、被窺伺還有自戀和戀物之間的闡發，都因為故事結局設計的這個偷窺的男人而顯得曖昧難堪。再加上文本又企圖含納女同性戀情慾流轉的議題，因此顯得刻意而鑿痕處處。「女同性戀」在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壇早已是熱門的創作題材之一，郝譽翔在小說的另一條主線選擇這樣的故事，究竟是順應文學流行風潮還是作家別有懷抱？文本裡的女性主體性，正是判斷的重點。這兩位被同一個男友遺棄的女子，因為情感和學業上的不順遂而發展出一段同性愛戀。是「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抑或者「相互愛戀」？小說沒有為讀者交代或者鋪陳這兩個女子之間的情愫生發，卻以含糊地在幾處簡單帶過「我們緊緊擁抱，彷彿B已經進入我體內的最深處，子宮底部不斷急促顫抖，溫暖的搔癢讓我有想哭的衝動」（〈洗〉，頁25）的語句。眼見女主角與B的情感不但未見進展並且有就此終止的趨勢，小說突然地安排B以最常見的戲劇性方式割腕自殺。女主角看到B的日記裡寫著「你見到聽到的不見得就是我見到聽的模樣，你所使用語言的指涉也非我所使用語言的範疇」（〈洗〉，頁29）作者在此處應該是想要烘托B對女主角的深刻戀情，可是我們卻看不到情節的鋪陳與組織。在這樣的情況下直接套用現成抽象理論，更是凸顯生硬、粗糙與賣弄。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萎縮的夜〉。³⁶ 面對著臥病床榻、失去知覺的年邁父親，女主角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回憶家庭過往。讀者大致可以拼湊出故事約

36 郝譽翔，〈萎縮的夜〉，收錄於《洗》，頁34-52。

略的輪廓：女主角的父親是個不負婚姻家庭責任的男子，母親因為受不了丈夫的風流成性而數度自戕未果。女主角自幼便飽嘗一次又一次的家庭悲劇，及長還必須溫順地聽從父母之言，嫁給自己根本不愛的男人。這段不幸福的婚姻僅僅維持兩年，女主角便遭逢與母親相同的被拋棄的命運。帶著幼女，女主角返回家鄉照料老父。就在病榻床褥間，那些無奈的、私密的甚至是不堪的過去伴隨女主角如泣如訴般的語氣，一流瀉。在男性虛張的性與權力暴力背後，這篇小說誠如文末附錄的評審意見所言，確實觸及了鮮少為人關注的「女性自慰禁區」。郝譽翔確實有意開發女性的情慾越界，透過亂倫、女同性戀、女性自慰的禁忌性來凸顯一股陰性的原慾力量。然而，同樣過猶不及的是，小說裡的女性人物長久以來面對的各種複雜的壓迫處境，沒有獲得應有的鋪陳或說明。故事反倒是投機討巧地在女體的情慾探索中流連，甚至便宜地與二二八歷史創傷、省籍差異以及身份認同等等面向連結。

接下來在這篇作者朱國珍自詡為「女性寓言小說」³⁷的作品裡，我們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性別修辭與符號的濫用，是如何可能地剔除了女性主義的政治性。《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以故作世故而挑釁的敘述語氣，講述一系列都會男女的情慾傳奇，與書同名的短篇小說〈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圍繞著酒吧裡的年輕男女描繪一連串出人意表的故事。³⁸愛喝長島冰茶的女子亞維儂，雖然自幼失去雙親，卻因為生活不虞匱乏而夜夜流轉於酒吧與男人之間。當一夜歡愛之後，亞維儂小心翼翼地為對方脫下保險套，在男人自以為性能力了得而沾沾自喜之際，她卻將精液倒出來抹在臉上；因為「裡面含有高成分的蛋白質和帶有有機化合物的DNA，是一種比任何名牌化妝品都更有效的純天然保養品。」（〈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頁24）這個不談政治只愛男人的亞維儂，後來成為富可敵國的經營之神，掌控全球金融秩序的她，可以隨意率性地用金錢玩弄「傾國傾城」的遊戲。酒吧裡的男酒保小張是一位男同志，而他的妹妹恰巧也是女同性戀，兩人為了不讓保守老邁的雙親傷心失望，異想天開地決定交換彼此的愛人，以假異性戀婚姻來瞞騙父母。小張的情人伊將是原住民，在還不知道自己性向以前，伊將愛的是族裡的女孩莉撒。莉撒從小就被母親賣到城市裡的妓女戶，因為她深愛母親，所以心甘情願地承受一

37 朱國珍，〈附錄：並非只是「新人類小說」〉，收錄於《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台北：聯合文學，1997），頁180。

38 朱國珍，〈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頁13-35。

切。在出賣皮肉生涯的20年歲月裡，莉撒有個愛人，他是某在野黨立委的國會助理；離開妓女院以後莉撒，也以被迫受害者的身份競選當上民意代表，再過多年，莉撒當上立法院院長。

這篇文章故事情節誇張離奇、人物言行乖張大膽；與前述作品十分相似的是，同樣竭力搜括了一切有關性別、情慾、同性戀、身份認同、原住民弱勢族群、政治乃至於「世紀末」等等議題素材。小說大刺刺標舉女性主義的寫作姿態，作者在書末以一種唯恐天下不知的口吻向世人昭告她的創作心志：

自以為了不起的大男人殺豬主義份子，一定不能忍受未來世界有一天，出身原住民的妓女可以堂而皇之的坐在國家級議事首府中掌管天下大事。在本文中，莉撒為了愛，可以忍受二十年的身心煎熬，只為了償還母親欠下的債；為了愛，莉撒投身反對運動，義無反顧的為了『野生動物』奮鬥終生，甚至當她的另一半（男人）都放棄的時候，她仍然信念堅定地以為自己可以拯救世人；於是她成功了一半，當上立法院長。（《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頁181）³⁹

小說故意選擇原住民婦女從妓到從政的「奇蹟」，再加上作者現身說法硬是要賦予文本的道德批判和正當性，這裡的女性主義立場根本是陽具理體中心的共謀。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文本，不會以一種輕挑玩笑的語氣來講述原住民婦女的苦難，更不會透過一副故作天真、事不關己的男性口吻來揶揄：

我們村子裡的女孩子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紛紛以當妓女為第一志願，國中畢業就搶著買火車票到華西街報到，結果她們長途跋涉來到華西街，卻發現所有的妓女院門前已經站滿了來自各地區的女人，她們來這裡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夠像莉撒一樣從妓女變成大人物。而我的族人因為長期的營養不良，又再度被迫擁擠到人群的最外圍，眼睜睜地望著這群島民再度剝削有可能讓她們光耀門楣的工作機會。（《夜

39 另外還例如：所謂性別議題，爭議已久；本人無須錦上添花。但是，現今女人的地位真的就憑幾個女性主義者的搖旗吶喊而獲得平反了嗎？在本文中，亞維儂歷經荒誕且漫無目的的生涯，最後成為掌控全球經濟的資本家，是作者刻意建構以女性為中心的現代神話。這在目前看來也許匪夷所思，但誰能保證在未來的幾十年間，女人操縱金融工具的智慧不會強而有力地勝過男人？而文本中結尾強調以經濟戰爭取代傳統的武器戰，更有其刻意安排的伏筆，這是對未來世界的一種預言……（頁180）有關於描寫精液處理段落，則是為了顛覆傳統父權結構下不平等的兩性關係，其用意是凸顯一個耽溺在自己性能力幻想中的庸俗男子，如何被一個更高明的對手（女性）戲弄，最後只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傳宗接代的精液成為別人把玩的工具，在性的權力遊戲中鬥爭失敗，落荒而逃。（頁182）

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 頁30-31)

從成英姝、郝譽翔到朱國珍, 她們的作品往往流於只是從修辭取巧、文類交混以及無以決定的性別流動和國族認同等等投機的面向上, 來敘述性別主體、情色想像或後設語言的美學技藝。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批評這些作品是如何地構不上「正確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標準, 而是在檢視的過程中, 提醒符號的粗製濫用是如何地「架空」、「馴化」了女性主義的政治激進性。女性的從屬地位, 不可能通過訴諸後現代主義裡的通俗美學而指望有任何特殊的解緩。⁴⁰當「另類」與「流行」幾乎成為同義詞、「權利」與「權力」在流暢的論述討論中成為可以隨意代換, 而「情慾流轉」與「性別表演」的理論在冷靜思考下也不再密不透風,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更應該小心謹慎, 避免陷入及時的激情發揮。在主流媒體的宣導下, 反而提供許多反挫論述、凝聚保守勢力的契機, 也徒然方便了資本主義商業機制, 利用運動訴求將「女性主義」打造成充斥街頭的活動商品。

四、結語

由西方輸入的、或因應外來影響所產生的前衛概念, 對台灣當代文學創作往往具有高度壟斷性, 而輸入的文學觀逐漸成為直接或間接形塑高層文化的主要因素。於是當代作家在實際創作上, 為了選取具有優勢潛力、足以自我標顯的形式和處理想像素材的文學成規時, 舶來的前衛觀念每每成為重要的吸收對象。以女性主義修辭、女性符碼與台灣當代小說的生產關係為例, 我們更可以清楚看見象徵性酬賞結構的最頂尖位置和物質性酬賞結構的頂尖位置往往是相通的。當前的女性主義台灣文學研究已經走到前可攻、後可守的「守門員」位置, 雖然不再侷限於傳統二元對立批判的陳腔濫調, 卻也不得不堅持開拓女性主義的閱讀視野和主體自覺。如果突顯流動的情慾、建構性能動主體可以挑戰既有的知識概念, 如果性別權力的鬆動可以帶動社會結構的改變, 那麼女性主義文學文化批評作為女性主義守門員的身分, 就必須釐清社會脈絡與主體定位之間的曖昧關係, 並且探究敘事與修辭在銜接個人想像與社會文化脈絡上所扮演的積極仲介功能。

40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asil Blackwell, 1989), pp.65.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德威，〈性，醜聞，與美學政治——李昂的情欲小說〉，《北港香爐人人插》（台北：麥田，1997）。
- 成英姝，《公主徹夜未眠》（台北：聯合文學，1994）。
- 朱國珍，《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台北：聯合文學，1997）。
- 李昂，《迷園》（台北：李昂個人系列，1991）。
- ，《北港香爐人人插》（台北：麥田，1997）。
- ，《自傳の小説》（台北：皇冠，2000）。
- 李欣頻，《誠品副作用》（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1998）。
- ，《廣告副作用》（台北：晶冠，2004）。
- 呂正惠，〈八〇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2）。
- 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時報，1994）。
- 施淑，〈迷園內外——評李昂的小説〉，《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1997）。
- 郝譽翔，《洗》（台北：聯合文學，1998）。
- 張小虹，〈性別的美學／政治：當代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慾望新地圖》（台北：聯合文學，1996）。
-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
- 黃毓秀，〈《迷園》中的性與政治〉，鄭明嫻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報，1993）。
- 劉亮雅，〈女性主體、荒謬困境與女性書寫：成英姝的《公主徹夜未眠》〉，《情色世紀末》（台北：九歌，2001）。
- 蕭新煌，〈共處共存和綜合〉，Samuel Huntington & Peter Berger主編、康敬貽等譯，《全球化的文化動力》（北京：新華，2004）。
- Chatterjee, Partha,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86.)
- Coward, Rosalind. "Are Women's Novels Feminist Novels?" in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asil Blackwell, 1989.)

二、論文

- 邱彥彬，〈「記憶失控錯置的擬相」：李昂，《自傳の小説》中的記憶與救贖〉，《中外文學》30卷8期，2002.01。

Convenience, Benefit and the Crisis of Superficiality: Feminism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Fiction

Liu, Nai-Tzu *

Abstract

In the event of the impulsive ideological trends in 1990s mainstream culture, 'feminism' wa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narrative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hat facilitated a kind of new social realism in Taiwan. Bizarrely,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which emphasizes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immediacy of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turned feminist theory,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social ranks of knowledge culture, into a fashionable consumer product. This literature trend is comm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fic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way authors, almost to the point of abuse, use symbols of larger literature capital efficiency. As 'feminist' theory is gradually legitimized via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founding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s,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clear gaps that exist between it and the actual recipients and creators, which is a seemingly united but actually alienated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select the most potential and sufficient forms of self-enhancement, themes, and aesthetic conventions, authors often have to conform with market economic logic in their works by using a consensus in public opinion of high cultur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Simply put, as feminist symbols, rhetoric and theory obtain stable cultural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ts users often render a variety of the political capabilities behind 'feminism' mere 'figureheads'

* Ph. 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convenience' and 'profit' incent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contemporary Taiwanese fiction fully reflects the complex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tyl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is study aims to re-read several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ontemporary female fiction, and examine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feminist thought and its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ields.

Keywords: feminism, high culture, contemporary Taiwanese fiction

